

大约三年前,我和王山同志(前《中国作家》主编)曾前往某省景区参加一次关于人类与河流关系的会议。不久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山里的青年》,发表于《新民晚报》。

在那篇散文中,写到我和王山同志认识了当地一名优秀的导游,他获得过省里的导游奖;热忱地建议我俩一定要认识一下他大学的师兄,也是他所尊敬的青年——在景区儿童活动中心工作的老师。热忱的导游之所以尊敬他的师兄,用他自己的话说,乃因师兄“人特别好,各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于是,我俩就认识了他“学习的榜样”——端的是一名相貌儒雅、文质彬彬,谈吐笃诚的青年。又因他俩的热忱建议,我和王山认识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一位开豆腐坊的姑娘。在远离都市喧嚣的景区,青年之间竟有那等真挚友谊,使我和王山深为所动。两名青年和那位姑娘形象都好,都是本省二本师范的毕业生,都在大城市闯过人生,都因为不同的缘故(主要是父母的身体原因)回归当地,重新开始他们平凡而又平静的生活。当然,他们并不讳言的最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的高房价和他们实际上并不高的工资,去除了一切必需开销,每月所剩无几。然而他们并不自卑,并不觉得自己便是人生的输家了。恰恰相反,我和王山,一个早已承认自己是老头和一个坚定拒

《山里的青年》外一篇

梁晓声

绝自己是半老头(王山)的长者,从他们的话语和表情中,感受到的分明是一种极难得的人生淡定、清醒和从容自信。

是啊,相对于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浮躁分子的北京而言,那三个青年使我俩着实意外了。那一处景区是真实存在的,那三个青年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因那景区的存在而在家门口就能挣到一份钱的曾经的山民是真实存在的,一位有回报社会之心的民企老板是真实存在的,连那一幅对联也是真实存在的:

山静似太古
日常如小年

北宋唐庚的这两句诗,由那三名青年的老师以古味十足的字体写成对联,贴在那时的儿童活动中心的门两侧,让人浮想联翩:王山同志还把那副对联照了下来。那被学习的榜样给我们老哥俩留下了更深刻印象——因为他的工作与儿童有关;因为他工作在贴有那么一副对联的房间里。

我在《山里的青年》这篇散文的末尾写道——真希望有一位好姑娘爱上那样的好青年;真希望有编剧关注到他们那样一个群体,并创作一部电视剧,为他们的人生鼓劲。

自然,我的第一种希望只能是个人祝福而第二种希望不太会引起关注。于是,现而今,我亲自将他们“写”入了三十集的电视剧中。

也自然的,“写”是指创作。这将是我创作的最后一部电视剧。

为什么是电视剧而不是小说呢?毋庸讳言,现如今看小说的人更少了。我想要为他们的人生鼓劲的心念却日益强烈——所谓创作冲动是也。某些作家每每将自己的某部作品献给某人或某一群体;那么,我之最后一部电视剧本,便是献给以上那样的农家儿女的。我任三届政协委员期间,“三农”问题是关注和调研的重点,对于农村和农民是间接了解的。现而今,还要加上农家儿女的就业问题,这是近年来突出的中国问题,那么便是“四农”问题了。教育资源之不平衡,注定使绝大多数农家儿女难以考上优质大学。他们即使孜孜以学,能考上省内的一般大学亦属不易。而那样的文凭,注定了将使他们在大城市的求职处于不利之境。保安、快递员、工地劳动者中,多有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很



快就会到了不年轻的岁数,漂泊感会使他们过早地疲倦了。

那么,后来他们都去哪儿呢?人生怎样了呢?

好现象是——随着中国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某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极可利用的农村,逐渐成为旅游热门地,确实为一些居村农民及他们的儿女提供了就近挣一份工资的机会。但是,一些者,不多也。

未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机会将会多起来吗?机会多了,收入会多吗?我替我所关注、关心的农家儿女们祈祝着。

一个更好的现象是——某些宜居农村不但成了中老年城里人经常租住的地方,也吸引一些有志于创业的青年成了那里的新居民,他们带着电脑、自拍设备、音响设备或画夹及种种创作之念成了那里的新居民。

我之创作与市场无关,我有幸是一个能够我手写我心的作家;我之创作与任务无关,我也有幸是一个可以完全自主地进行创作的作家。

杜甫晚年有诗言:

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

我并不忧国——我相信中国之未来。在年近八十的岁数,还能一字字一行行地在A4纸上“写”出一部本来,为自己所关注的农家儿女们的人生鼓劲,实乃大欣然也,夫复何求?

到杨树浦路时,冷汗早已浸透衫衫。

最近故地重游,乘地铁12号线到复兴岛站。鱼品厂早已消失,只有斑驳墙面上“安全生产”的标语,还隐约指向我曾经的车间。漫步在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大道上,海风裹挟着陈年的鱼腥味扑面而来。说来可笑,在岛上工作多年,竟从未去过复兴岛公园。如今第一次见到白庐——这座95岁的老洋房静立园中,白色外墙被岁月染成象牙黄,爬满常春藤。

如今的复兴岛成了网红“痛岛”,游客们举着手机在锈蚀的吊机前摆拍。我站在公园长椅旁,看一群穿汉服的姑娘在白庐前转圈,裙摆飞扬。海风突然送来一阵熟悉的鱼腥味,恍惚间又看见40多年前的我,端着搪瓷碗,在食堂窗口前踮起脚尖……



夕阳下的捕鱼人 (艺术摄影) 张文俊

年少时,父亲去广州出差带回一对塑料外壳热水瓶,红得像团燃着的火,成了邻居间的新鲜物件。那时候,弄堂里的灶间或堂屋,要么立着竹壳热水瓶,浅黄色篾条缠得紧实,摸上去带着草木的糙感,一不小心手还会被篾刺到,提手处的竹片只有用旧了才顺手,瓶胆稍碰桌角,篾条会“咯吱”响,像提醒你小心;要么是搪瓷壳的,表皮但凡磕掉一块瓷,黑铁皮间的疤块很难看;而这对大红塑壳热水瓶显得晃眼,提手是同色塑料弯成的弧,丝滑又牢靠,指甲划不出印子,脏了拿抹布一擦就清爽。

我记得,有天放学回家,父亲在客堂间叫住我,要我对这热水瓶写一篇说明文。许是那时常被父亲要求临摹物件写作,日子久了竟摸出些门道,后来写文章从不像同学、同事那般犯怵。那天的文字里,我细细对比了竹编、搪瓷与塑料壳材质的不同,从色泽到触感,从耐用度到模样,都有描写,父亲看了连连点头,还有一卷水果糖当奖励。

塑壳的这抹红很快便成了弄堂的“明星”。邻家大哥阿祥结婚时,阿祥妈来借红塑壳热水瓶,说放在新房梳妆台上当摆设。她是我妈30多年的小妹妹(那时不叫闺蜜)。闹新房那天,大家还围着新房这对热水瓶,啧啧夸奖呢!后来弄堂里好几对新人在婚房都用塑壳热水瓶撑过场面。

那年学校组织去崇明学农,我带着它成了班里少数拥有塑壳热水瓶的学生。那抹红陪着我在田埂上穿梭,夜里倒出热水泡脚时,暖意从脚底直蹿到心

塑壳热水瓶

陈甬沪

里。可还是来了意外,一天开完班会回寝室,天已擦黑,我在田垄上一滑,热水瓶“哐当”一声滚出去老远,我大叫一声急得跑过去捡,心想这下完了,可这塑料热水瓶在地上打了个滚,外壳连道划痕都没有,晃了晃瓶胆也没碎。可第二天它就“罢工”了,带回市区才知道,是内胆的保温层摔坏了,那阵子我捧着空壳子,心里空落落的好多辰光。

没过多久,塑壳热水瓶像春天的蒲公英,乘着风飘进了更多人家。颜色也多了起来,孔雀蓝像浸了水的天,果绿色透着生机,米白色干干净净,有的瓶身还印了几何图案,虽不如搪瓷壳那般花哨,却带着股清爽利落的新派头。竹壳的渐渐被大部分人家弃用;工艺革新后的搪瓷壳,样式也不断翻新而成新宠,传统铁皮围桶式搪瓷壳只有少数人在使用;塑壳热水瓶则模样翻新速度更快,使用更轻便,外观更精巧,同时价格也更便宜,更受大家喜爱。

当年我结婚时,阿祥送了一对铝质金色热水瓶做贺礼。那瓶身雕着龙凤呈祥,金闪闪的煞是喜庆。老房子拆迁时碰到阿祥哥,他还念叨着:“再也没有哪样物件,能像当年那对大红塑壳热水瓶风光了。”如今讲究并倡导“断舍离”,可这对铝质龙凤呈祥热水瓶,还有那只红塑壳热水瓶,我还不舍得丢。它们就摆在阳台的柜子上,阳光照过来,能看见时光在壳子上留下的细痕。其实舍不得的不是物件,是舍不得岁月里,对写作养成的感恩,对新鲜物件的雀跃;那一缕缕热,暖乎乎的,藏着心里最柔软的时光。

羹,六分钱。碗虽不大,鱼内却堆得冒尖。厂里不时发福利:大口瓶装的橡皮鱼一毛五,滴剂乳白鱼肝

鱼香小岛

周 邢

油,橙汁鱼肝油,维生素E丸,还有扁罐头装的凤尾鱼。隆冬时节,厂区就格外热闹。天还没亮,浩浩荡荡的人群就涌进来——都是来剥橡皮鱼的零工。他们坐在露天的矮凳上,双手冻得通红开裂,渗着血丝,但为了多劳多得的工钱,没人抱怨。我常站在车间窗口望着他们,鼻腔里满是咸腥的寒气。复兴岛这个弹丸之地,不过一平方公里出头,却挤着鱼品厂、渔轮修造厂、绳网厂、两家渔业公司、沪东造船厂和数不清的仓库。几万人的孤岛上,只有一条77路公交线。从定海路桥步行到厂里要四五十分钟。记得有次加班错过末班车,我和小姐妹摸黑走夜路。路灯昏黄如豆,走

七夕会

七夕会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一种繁殖能力很强的植物。小时候不懂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晓得一到夏季,母亲总会割些鱼腥草晒干,天热时煮茶喝。这样的茶水我也不爱喝,闻着那气味就只想逃。母亲为了哄我们喝,有时也允许我们加點白糖。喝了这茶,可以清热。有时候,家里有人尿频尿急,母亲就会赶紧跑去田野,连根拔回一捆鱼腥草,这样连着喝上几碗,收了身上的暑热和湿气,那症状自然就消失了。也因此,我们从小就熟悉鱼腥草,甚至觉得它是朋友,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出手相助。

有一次,在贵阳和男友逛菜市场,看到菜摊上摆着一堆白白的根须。当时吸引我的是它的名字——折耳根。心想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我也买了一把,当时我只

是出于好奇。其实我并没有立刻发现折耳根的真实面目,似乎去掉了叶子的折耳根闻着并没有那么腥。可吃起来,怪怪的,总觉得这味道熟悉。男友的同事对吃有讲究,他说

折耳根的味道

简 媛

这折耳根放鱼里煮了吃味道不错,还说这玩意在我们湖南多了去了,都没人吃。我赶紧问,这菜在我们湖南叫什么。他哈哈一笑,说出“鱼腥草”三个字。原来就是它啊。看来我是能吃它的。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慢慢接受了折耳根,甚至爱上了它。回到长沙后,我有意去寻访了一些菜摊,发现我们湖南的菜摊比贵州的更丰富,不



边看边聊

从上海到伦敦有多远?如果飞越西伯利亚和北欧上空,直线距离9200公里。凌晨一点,我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登上东航波音777飞机,十二个小时后,加上时差七个钟头,黎明破晓,抵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黑魇魇的天际线上翻涌出金色朝霞。

我在飞机座位上短暂地滑入过梦中,勉强在穿梭欧亚大陆两端之间倒完了时差。下了飞机,排队过海关,取完行李,航站楼外是阴冷的早晨,必须穿上外套,相较于酷暑的上海,已是换了人间。在携程上预订的接机司机拍马赶到,从遥远的盖特威克机场上高速公路,穿越英格兰乡野,又地图上绕了颇大一圈,终于自西向东进入伦敦。

酒店订在肯辛顿,靠近切尔西,隐藏于一条小路间,许是有一百或两百年历史的房子。侥幸在上午办完入住,房间里稍作停留,放下行李,手机上打优步(Uber)出门。司机是非洲裔,不同于刻板印象中阴郁的英国人,颇为健谈,或许常接中国客人,不断询问一些常用汉语的发音。目的地是海格特公墓,从肯辛顿出发车程四十分钟,在伦敦城里堪称赶远路了。司机抄了肯辛顿公园和海德公园之间小道,路过摄政公园与国会山,离开伦敦城的繁华盛景,经过一条上坡小路,一边是花园住宅区,另一边则是森严的墓地。我才明白海格特(Highgate)原意就是“高门”,伦敦北部一处高地。到了公墓门口,司机先生问,要去看望哪位故人?当我们说出那个名字,司机竟然表示一无所知。

小道两侧都是公墓大门,西侧更为庄严巍峨,但我要去东侧的墓园。此地长眠着不少名人,常有慕名而来的访客,因此要收取门票,成人票每张7英镑。躬身而入,墓碑鳞次栉比,有的几乎崭新,有的碑文上的时间不过近几年,但也有百年以上,风雨斑驳乃至颓坏。我曾经去过巴黎的蒙帕那特公墓与拉雪兹神父公墓,给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王尔德以及巴黎公社墙献过花。我从不恐惧墓园,哪怕脚下的墓碑下就埋着遗骨。今天造访墓园的来者不多,前面有个老师带着几位高中生,对着墓碑讲解,兴许是某位历史名人,可惜墓碑上文字漫漶不清。我早已在地图上查过方位,顺着一条岔道而上,前后越发静谧,刚才的游客都消失了,唯独我们越走越深,仿佛要深入到历史的另一面去了。山重水复之际,小道拐角处,我觅到了你。

你在长方形大理石墓碑上等我,浓密胡须簇拥的面孔已化作青铜。本该是胸膛和心脏的位置,镌刻金色文字——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此之下,我看到了你的名字。再往下有一块玻璃板,保护若干姓名,包括你的夫人,你的大女儿和外孙,你的二女儿和女婿——你们一家团聚于此。大理石墓碑下半部,几行金色文字——“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原文全是大写字母)任何人的翻译都带有主观性,因此我选择用AI解答:“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了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是的,你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你的脚下摆着几束花,简易瓶子和水壶里插着菊花,还有几颗苹果与橘子。当我走了两万里路,飞了大半个昼夜,从欧亚大陆最东岸,登陆最西岸外的一座大岛,只为在你面前放下几枝鲜花,肃立,思索,颤抖……不知何时,身后多了一位印度或巴基斯坦裔的年轻人,跟我一样凝视墓碑,凝视你。

我看见一只小鸟降落在你的青铜头像上,驻足,梳羽,如你一般思考人类的历史,或者未来,再度振翅而飞,消失在伦敦阴郁的天空。

再见,卡尔·马克思。

仅有根,还有叶,根叫折耳根,叶叫鱼腥草。我心想,这鱼腥草的叶子还真有点像耳朵。

后来我又学着凉拌鱼腥草。慢慢地,不管是根还是叶,我都爱吃了。有时母亲还会从家乡给我寄来晒干的鱼腥草,天热的时候我就会煮一大壶鱼腥草茶,这时女儿就会皱着眉头说:“难喝,不想喝。”我却像我母亲一样劝她,喝了这水,夏天身子就舒服了。母亲告诉我,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鱼腥草能收暑热、祛湿气,对身体有好处。记忆中,在云南玉溪吃过一道茶花鸡,我一直认为这道菜里那白白的根茎就是折耳根。后来去北京,朋友点了折耳根这道菜。我们相视一笑,心神领会,似乎这道菜成了我们辨识彼此的密码。

造访一位智者

蔡 骏

美食